

人才盛衰与蜀国兴亡

孟繁冶

许昌学院学报编辑部

[关键词]: 蜀国, 三国时期, 兴亡历史, 人才

[摘要]: 三国时期的蜀国, 自建安十六年(211年)刘备入蜀至后主炎兴元年(263年)止, 前后53年。三国之中, 它国力最弱, 地盘最小, 人口最少, 长期笼罩在亡国的危机之中, 但它依然存在了半个世纪之久, 最后亡国, 亦实属难免。蜀国50年盛衰兴亡的历史, 其因素固然多多, 但不同时期人才的兴旺与匮乏不能不说是其重要原因。

三国时期的蜀国, 自建安十六年(211年)刘备入蜀至后主炎兴元年(263年)止, 前后53年。三国之中, 它国力最弱, 地盘最小, 人口最少, 长期笼罩在亡国的危机之中, 但它依然存在了半个世纪之久, 最后亡国, 亦实属难免。蜀国50年盛衰兴亡的历史, 其因素固然多多, 但不同时期人才的兴旺与匮乏不能不说是其重要原因。

一、蜀国早期人才的兴旺及其原因

东汉黄巾起义后, 各地混乱, 刘备乘势起兵, 以战功任安喜尉, 后领平原相。徐州牧陶谦病故前以刘备接本州刺史,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表其为镇东将军、封宜城亭侯, 迁任豫州牧, 为其事业的开端。刘备屡败屡兴, 后与孙权联军在赤壁大胜曹操, 为荆州牧, 占有长江中游地区, 有了事业的根基。十数年间他聚集了一大批人才, 其作用直至蜀国中期建兴末年, 即诸葛亮病故前后。

以《三国志·蜀书》入传人物的记载方式, 据不完全统计, 正传83人, 其中附传14人, 又另附3人, 在刘备之前有2人(刘焉、刘璋父子), 先、后主2人(刘备、刘禅), 皇后4人, 皇子3人, 实际可表列的为86人, 书中所附杨戏《季汉辅臣赞》人物表列32人, 各传所附可表列19人, 总计137人。从中可以看出以早期追随者为主, 又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刘备到荆州之前籍贯为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士, 二是到荆州后的长江中游人士, 其他是后期刘备进入益州、开创蜀汉时期所属的巴蜀人士。这三类人可以称作三个地区性集团, 前两个集团人才比较集中, 是刘备开创事业依靠的基本力量, 例如诸葛亮(董厥、樊建)、关羽、张飞、马超(比他人略晚)、赵云、法正、许靖、麋竺、孙乾、简雍、伊籍等人可谓第一集团; 第二集团则有黄忠、庞统、董和、刘巴、马良、魏延、陈震、陈祗、刘封、廖立、李严、杨仪、霍峻、王连、向朗等人。如若没有这些早期的人才, 蜀汉政权是否可以建成, 刘备称帝前后能否延续如此长的时间, 确实不可想象。第三集团是后期人物, 属于守成一类。从前两个集团看, 是什么原因使蜀汉早期人才如此旺盛, 就有必要对当时的社会状况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

首先, 东汉宦官专政引起的党锢之祸不仅使高中级士人仕途受到影响, 而且殃及初级士人失去晋身之阶, 所以一旦有出人头的机会, 他们便会投靠、聚集在某一位赖以达到自己目的的杰出人物周围, 刘备正是如此。诸葛亮的身世虽然可以追溯到汉司隶校尉诸葛丰, 但其父诸葛圭仅仅做到太山郡丞, 所以诸葛亮只能随叔叔诸葛玄依附荆州牧刘表, 叔玄卒后, 只能做一介农夫, “躬耕陇亩”(《诸葛亮传》), 后得刘备三顾请贤, 方成为一历史名人。法正为扶风眉(今陕西)人,

建安初入蜀依附刘璋，“既不任用”，“志意不得”（《法正传》），因而劝刘备入蜀取代刘璋，使刘备有了真正的立足之地。许靖在仕途上原本“不得齿叙，以马磨自给”（《许靖传》），后在董卓专权时才为御史中丞，不久四处逃难，至边远的交趾，为刘璋招请入蜀，璋败，归于刘备。麋竺是个商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巨亿”，于建安元年便“进妹于先主为夫人，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入蜀后“赏赐优宠，无与为比”（《麋竺传》）。孙乾、简雍、伊籍均无身世记载，社会地位不会太高。其余董厥、樊建是附从诸葛亮，关羽、张飞、马超、赵云是武人，出身较普通。这是第一集团的基本情况。第二集团的人物身份大体相似。黄忠是武人，“先主南定诸郡，忠遂委质，随从入蜀”（《黄忠传》）。魏延亦是武人，“以部曲随先主入蜀”（《魏延传》）。庞统“少时朴钝，未有识者”，以郡功曹“随从入蜀”（《庞统传》）。其他人基本上是地方权贵豪族，刘备控制荆州及邻近地方时招揽而至，随后跟从入蜀。正是追求为官为宦和权势地位，使这些初级士族人士竭尽全力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并且立志效忠。除了刘封、廖立、李严、魏延、杨仪等寥寥数人曾有不满意或一般的不轨行为之外，上述两个地区性集团中的人物都能为蜀汉政权的建立、巩固和维系起到促进作用，他们本人也成为颇有名望的历史人物。这一点不能不说是蜀国早期人才称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刘备在漫长的征战和创建政权过程中，战斗的足迹几乎遍布全国，网罗的人才来自五湖四海，能够充分突出取长补短的优势，文臣武将多数具备独挡一面的能力。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其言不虚；庞统被誉为“清雅有知人鉴”，司马徽称其为“南州士之冠冕”，后来果真显名；法正“著见成败，有奇画策算”，诸葛亮也“每奇（法）正智术”，多次为蜀确定谋略；陈寿用蒋济之言称许靖“大较廊庙器也”，“麋竺、孙乾、简雍、伊籍，比雍容风仪，见礼于世”，可谓一时之才士；董和、刘巴、马良、陈震、董允等人，陈寿称之为“皆蜀臣之良矣”。武将只取其部分评语便可见一斑：“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世为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马超“能因致穷致泰，不犹愈乎！黄忠、赵云强挚壮猛，并作爪牙，其灌、滕之徒欤？”《三国志》所收蜀汉人物虽少，但大多为称赞之词，仔细分析，应该可信。《晋书·陈寿传》有一段话，曾引起后世史家争议：“或云丁仪、丁寓有盛名於魏，寿谓其子曰：‘可见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计划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但是实际上，该传也承认“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忠之才”。刘勰《文心雕龙·史传》评价说：“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迁、固，非妄誉也。”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则云：“剪裁斟酌时，自有下笔不苟处，参订他书，而后知其中谨慎。”可见陈寿在记叙各种历史事件和人物时，不仅仅条理清晰，言简意赅，而且记事严谨，无夸大之言，或故弄玄虚。因此，据其记载作出蜀国早期人才称盛，并非言过其实。

再次，蜀国早期之所以人才称盛，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为时代所然和社会状况所以然。从东汉后期开始，作为两汉思想理论的经学已经悄然向玄学转化，陷入章句之学的儒家学说，与急剧变化的社会出现了不协调，统治阶级和整个社会都不得不对儒学进行深刻的反思。儒家所碰到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治理乱世，忠、孝的观念已经不起太大作用，之乎者也敌不过刀枪箭镞，儒学大师绝无仅有，难成气候，无法支撑将倾之大厦。玄学便应运而兴，老庄道家学说取代了儒学。佛教此时又顺应混乱社会的需求，广为传播，进一步冲击儒学。这种背景之下，人才标准和选官制度发生巨大变化，原来的征辟察举早已名不符实，“举秀才不知

书，举孝廉父别居”的现象相当突出和普遍，法家学说因此受到重视。《三国志》卷十六记杜恕谈当时风气：“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竟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曹操便前后四次颁《求贤令》，强调“惟才是举”。乱世出英雄，一生戎马倥偬打基础坐天下的领袖，用人的标准不会讲求出身是否显贵，首要是看实际才能和实践功绩，与刘邦的用人之道如出一辙。刘备真正认识到了这一点，并确实加以实践。

多次，当时的人才标准和选官方式正从基础于清谈、清议的征辟察举向九品中正制和后来的门阀世族制变化，各方面尚未完善，不成系统，正是下层士族和非士族出身者争取提升社会地位的大好时机，所以出现了明显的转折。刘备与曹操、孙权等当时纵横驰骋天下的英雄一样，深明此理，网罗了大量人才，成就了政权基业。时势造英雄，时势出人才，这实际上是与社会形势紧密相联的，也是蜀汉早期人才得以称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是刘备个人求才重能尊贤礼士的结果。《三国志·先主传》及注中对此多处提及：“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杰，年少争附之。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等赀累千金”，“见而异之，乃多与之金财，先主由是得用合徒众”。“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众多归焉。”刘备领徐州牧时为吕布所败，依附曹操，“曹公厚遇之，以为豫州牧”，“从曹公还许，表先主为左将军，礼之愈重，出则同舆，坐则同席”，“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随之与曹操为敌，南附刘表，“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入蜀之前，“备前见张松，后得法正，皆厚以恩意接纳，尽期殷勤之欢”。“先主入益州”，刘璋使其讨伐汉中张鲁，“未即讨鲁，厚树恩德，以收众心”。刘备随即击刘璋，“璋出降，蜀中殷盛丰乐，先主置酒大飨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还其谷帛；先主复领益州牧，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麋竺、简雍为宾友；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漾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诸如此类，难以尽书。刘备自己便说：“济大事者必以人为本。”史家习凿齿说得更具体：“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夫！”这种因素所起的作用，往往还比其他因素更突出更重要更得人心。

二、蜀国中期人才由盛转衰的变化

蜀国早期的人才可谓盛矣，但是他们几乎都是益州之外的人士，也即归属上述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两个地区集团，而在益州没有根基。这些人的籍贯相当分散，可说是五湖四海聚集的团体。入蜀之前，跟随刘备四处征战，几乎与家乡脱离了关系，失去了宗族、土地、财产、臣仆等优越条件，基本上是一介独身，入蜀靠的是自己的能力、才干以及上下左右的关系，所以他们特别注重身份地位。正是这种原因，造成蜀汉人才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形成规律性的结果，逐渐由盛转衰。其中原因很多，也较为复杂。

当初，刘备于建安十九年攻入成都，在益州确立了统治地位之后，其集团内各层次人士便开始考虑个人利益问题，但因刚刚立足，尚待稳定，“分成”举措暂未提及。至建安二十六年，“群下劝先主称尊号，先主未许”。诸葛亮对大家的内心想法是十分清楚的，若不以此笼络凝聚人心，给予相应的优渥，将不利于政权的稳定，因而用东汉耿纯劝世祖即帝位的话进奉刘备：“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从议者，士大夫各归求主，无为从公也。”并以此进一步明确提出：

“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纯言耳！”可见，在其他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以功任官封爵是他们遂愿的最好方式（诸葛亮传）。但是子孙可以袭继官爵，却不一定能够秉承先人的才智能力，因而也就无法保证人才继续称盛。

随从刘备征战外来居蜀者，难以在异乡即时积蓄起太多的土地、财产和庄户佃农，作为兴业的基础。诸葛亮在蜀国文武群臣中位高势显，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自己向后主申报的财产是：“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诸葛亮传》）其他倚为左右的文武亦是如此，只在特定情况下才有一次性赏赐：“益州既平，赐诸葛亮、法正、（张）飞及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锦千疋，其余颁赐各有差。”此后不见有类似的大规模赏赐[1]（《张飞传》）。关于不动产的大量赏赐或占有，几乎没有记载，偶而有此情况，也遭到激烈反对：“益州既定，时议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赵）云驳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今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须天下都定，各反桑梓，归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先主即从之。”[1]（《云别传》）显然，当时这些人在蜀国难以成为强宗豪族，所以特别强调只有回到故乡本土才是可能的。基础根业不牢固，加上囿于当时的教育体制和选官制度，而且“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地促民少，人才自然难以相继。从后来门阀士族定型时益州著名者寥寥，亦可反证。

三、蜀国后期人才缺乏与守成之艰难

总体加以分类排比，蜀国的人才一般是个人事功比较突出，而鲜有群体出现。早期除了刘备本人，有统率能力的就只有诸葛亮，庞统、法正称誉虽高，并无促使西蜀腾跃式转折上升的创举，而且早逝，前者36岁，后者45岁，且皆在刘备之前。其他继承人无从谈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人才日渐凋零。武将在俗称“五虎上将”之后，已无可称道者，俚语因有“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的传言。被诸葛亮称作“凉州上士”、寄予厚望作为接班人的姜维，其实并无杰出建树，屡次战败，甚至于段谷为魏将邓艾大破之后，“星散流离，死者甚众，众庶由是怨渎，而陇以西亦骚动不宁”。后多次为邓艾所败，“维本羁旅托国，累年攻战，功绩不立”，“故自危惧”，屯田种麦以避。最终西蜀之亡，姜维难辞其责（《姜维传》）。蜀后继无人，也实所难免。益州于当时来说，只是中国西南一偏远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方面都无特别之处，即使有人才，相较发达地区的曹魏和东吴，亦大显逊色。

刘备之后，诸葛亮主持之下的蜀国，在用人之道上出现偏差，也是其原因之一。关羽失荆州战死，导致国家实力巨损，是此转折点。刘备为之大举伐吴，名义上是为关羽复仇，实质上事关益州是发展还是被局限的前景问题，势必要争夺荆州控制权。可惜出师之时张飞为部下所杀，刘备则于夷陵为东吴大败，病死白帝城。后主刘禅继承法位，昏愚暗惑，则由诸葛亮主政。但是“诸葛亮一生唯谨慎”，连年攻魏，六出祁山，以进为退，以攻为守，能保住以弱抗强，却于魏无大损伤。观不用魏延之策，使其率“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亮以为此县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其谋略之保守昭然。诸葛亮用人，观后人对其所托三人的评价便可洞悉，陈寿曰：“蒋琬方整有威慑，费祋宽济而博爱，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是以边境无虞，

邦家和一，然犹未尽治小之宜，居静之理也。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黷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裴松之曰：“蒋、费为相，克尊画一，未尝徇功妄动，有所亏丧，外却骆谷之师，内保宁辑之实，治小之宜，居静之理，何以过于此哉！”干宝曰：“姜维为蜀相，国亡主辱弗之死，而死于会之乱，惜哉！”概而言之：荆州得失影响甚大，诸葛亮谨慎以保作为不及，前后执政施策守成无功，姜维之用折损国力致亡，后主愚惑阉竖，终招巨祸。

同时，蜀汉在与人才成长环境相关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均处于滞后状态，只囿于守成自保，谈不上发展图强，基本没有政治改革、教育改善、经济改革、军队改造、战略改变、选官制度改良等方面的措施。巴山蜀水之外的曹魏、东吴在翻腾变化，蜀汉却故步自封，蕞尔小国，不亡更有何待！

蜀国的建立、存在、延续和灭亡，与历史上的其他朝代或政权包括同时代的曹魏和东吴大不相同，人才的盛衰因素尤为重要突出。蜀国政治、经济、军事既无优长又无创举，在与魏吴的关系、与境内民族的关系及各阶层的关系诸方面，着眼点首先考虑的是自保，没有人才成长的社会条件。显然蜀国人才盛时，尚能与魏吴成对峙之势，人才凋弊之时，蜀国则明显处于下风。

西蜀兴亡历史，除去次要因素不论，概而言之，兴则系于人才，亡亦关乎人才。此处有必要重复刘备的由衷之言：“济大事必以人为本！”历朝历代，应当说都是此理。